

薄一波：文武双全的才子

薄一波是有名的才子。抗战前，他曾被国民党关在北平的草岚子监狱。南京曾想立即枪毙薄一波等12名重犯，可是华北的国民党当局不同意。理由非常有趣——这个大才子太厉害了，碰到内政、外交、经济等解决不了的问题，华北的国民党当局就要去监狱求教薄一波（这一点国共双方都有记载）。而薄一波也很有趣，把话说到最关键的时候，就告诉这些国民党大员——是否给你们出主意，需要我党同意。

国民党那边没办法，只好替他去找组织。就这样，薄一波和中共华北局取得了稳定的联系，同意有限度地给国民党“支招”，同时给监狱中被捕的同志争取了政治学习的条件。中共瓦窑堡会议的文件，这些人就是在监狱里看到的。

关于国共合作，西安事变之前的华北地区就已经颇有建树了。其中，薄一波这个坐牢的才子功不可没。好像也因为这个原因，薄一波还担任了国民党北平第二监狱支部的中共支部书记。

吃人家的嘴软不是？薄一波是策划兵变的“要犯”，哪个国民党领导都不敢随便放他，可也不敢慢待。一说薄一波在监狱里享受中顾委待

遇，说话比监狱长还好使。这时候华北局的刘少奇和柯庆施想出了一个“假自首”的模式，和国民党华北当局取得一个默契——让狱中的党员写假自首书，国民党这边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人。

薄一波一听就不干，他认为这样做以后就讲不清楚，清白也变得不清白了，牢底坐穿也不出去。这一来国民党高兴，共产党可不高兴了，最后说到经中央批准记档，他才勉强同意。出狱以后，时任五大常委之一的任弼时，还专门和他们谈话以安军心。

不过，当时释放薄一波，第一个迎接他的可不是自己人。阎锡山的特使梁从熙早在监狱大门里头就堵上了，毕恭毕敬地问：“是薄一波先生吗？请问您老家是山西的吗？阎主席想请您帮忙。”——阎锡山要和薄一波“共商保晋”。

可薄一波偏偏不买这个面子——不行，有事儿跟我们组织商谈去，我自己做不了主。

后来我党还是同意和阎锡山合作了，成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。派了一文一武，都是阎锡山心仪的。这文的就是薄一波，武的就是徐向前。阎锡山和薄一波一交谈，就的一种相

见恨晚的感觉。此后，阎锡山决定：政治上依靠薄一波，军事上依靠徐向前，这二位都是山西人。

别说，这二位山西人帮阎锡山抗日守土还是真卖力气的，不过可不帮他继续当土皇帝。后来，徐向前代表党把山西打了下来。

薄一波的专长是经济，不过抗战时也得带兵，国共双方都接受，薄一波就做了新军决死第一纵队总政委。不过他手下多有阎锡山的旧军官，薄一波虽然厉害，毕竟是念书的，镇不住场怎么办？军官们本来以为来的是个秀才，一看却是个大胡子，反差太大，愣没反应过来。行，只要你们开场不闹就好，等到见识了薄一波的本事，就没人闹了。连当纵队司令的鲁英麟(傅作义的亲信将领，外号“鲁蘑菇”，后来担任三十五军军长，因战败自杀)，只要薄一波在，就不敢动兵符……

这段带兵经历对薄一波很有好处，所以开国的时候，当选北京卫戍区政委。



薄一波在延安

名人轶事

元宵节为何定在正月十五

据记载，元宵节起源于汉代。汉高祖刘邦死后，吕后篡权，吕氏宗亲把持朝政。后来吕氏势力铲除后，拥刘恒为汉文帝。由于剪除吕后宗亲那天晚上正好是正月十五，所以文帝上台后，每年正月十五晚上都微服出宫与民同乐，以示纪念。在古代，宵就是夜的意思，正月叫做元月，汉文帝就这样将正月十五定为元宵节。

元宵节为何要张灯

在我国民间，每年元宵节张灯的习俗，原是佛教的专利。佛教教义把火光比作佛之威。而灯火的照耀则有妙用，一是破人世的黑暗，二是现佛之光明，以去芸芸众生的烦恼。据佛教传说，释迦牟尼示现，降服神魔是在西方的12月30日，即东方的正月十五。为纪念佛祖的神变，此日需燃灯法会，故正月十五燃灯之风由此而来。

我国元宵节张灯是从东汉开始的。汉明帝感于佛法，敕令正月十五佛变之日燃灯，以表佛法大明。

新年钟声为何敲108下

我国古代认为，“9”象征天，具有吉祥如意之意，而“9”的12倍是“108”，故将“108”的含义推向极限。明代学者朗瑛在《七修类稿》一书中说：“叩一零八声者，一岁之意，盖年有十二月，二十四气，七十二候，正得此数。”

“108”在佛教里占重要地位，尽管各寺庙撞钟节奏和韵律不同，但钟声均为108下。佛教认为人有108种烦恼，敲108下可消除忧虑。

舞狮溯源

相传，舞狮师技艺引自甘肃西凉“假面戏”。舞狮引入中原后，渐渐分成“北狮”和“南狮”两派。北狮即魏武帝钦定的北魏“瑞狮”，小狮一人舞，大狮双人舞。舞狮者全身披包狮皮，下穿和狮身相同毛色的毛裤和金爪蹄靴。观看者无法辨认舞狮人的体形，引狮人以古代武士装扮，手握旋转绣球，配以锣鼓逗引瑞狮。南狮也是双人舞，但舞狮人下穿灯笼裤，上面仅仅披一块彩色的狮皮而舞。和北狮不同的是，南狮引狮人头戴大头佛面具，身穿长袍，腰束彩带，手握葵扇逗引狮子。

本栏稿件
提供：李德昌

陈明：丁玲值得我用一生去爱



陈明与丁玲的合影

陈明是丁玲的研究者，也是丁玲最后的爱侣。他们在延安相逢，在西战团艰苦而又紧张的战斗生活中相知相爱。丁玲和陈明的关系，在延安成了一些人谈论的话题。他们觉得，丁玲和陈明之间有两个鸿沟，一个是资历，一个是年龄。最终他们还是历经磨难，在延安蓝家坪一间窑洞中结合了。这一年丁玲38岁，陈明25岁。本文是陈明的自述，现已90多岁高龄的老人陈明强调说：“我这一生，大部分时间是和丁玲共同度过的，而且和她在一起的岁月，是我生命中最宝贵的年华。”

我说，主任，你也应该有个终身伴侣了。丁玲反问我：我们两个行不行呢？

到马列学院后，关于我和丁玲的传言很多，说什么丁玲爱上了一个小丈夫啦，等等。我听了很不高兴，但也不在乎，丁玲更不在乎，她鼓励我：随他们说去，让他们说上几年，还能说几十年？我也表示，为什么男人年纪大，女人年纪小就行，反过来就不行？我们就是要反这个封建。我和丁玲结婚的时候，柯仲平问我说：你们年龄相差这么大，行吗？还在上海读高中的时候，魏金枝老师带我们去富春江游玩，在船上，同学们谈起各自的恋爱观，我说我最讨厌娇滴滴、花枝招展的女孩，坐电

车碰到这样的女孩，我也不让座。漂亮不漂亮在其次，“情人眼里出西施”，只要不讨厌就行，关键是心要正，思想要一致。所以，我在西战团里对丁玲这样非常热情、直爽的女性很有好感。她对我那么悉心照顾，我在心里把她当作姐姐一样，虽然朦胧中觉得她对我的关切超过了一般的同志关系，但对于成为事实上的恋爱关系，说实话，我没有心理准备。直到有一次挑明了，才对我的生活、情感产生巨大的影响。

那是在一个小饭馆里，我们坐在炕上，我说，主任，你也应该有个终身伴侣了。丁玲反问我：我们两个行不行呢？我听了吓了一跳。事后，我在日记中写道：让这种关系从此结束吧！她看到后，说：“我们才刚刚开始，干吗要结束呢？”我的考虑不是因为她是名人，地位比我高，也不是因为她的年龄比我大。她1936年11月到陕北，我1937年5月到延安；她是主任，我是股长，我脑子里根本没有“地位”这个概念。我思想上压根儿也没这个准备，只是觉得她的经历比我复杂，过去的生活道路不一样，将来能不能走到一起，我没有把握。

1940年秋，剧团在陇东庆阳，我和席萍结了婚

1939年9月我离开马列学院，去了烽火剧社。

我在烽火剧社认识了一个女团员，叫席萍，鲁艺毕业，搞音乐的，也是个知识分子，我们容易相互同情。她平时对我很好，那时我与丁玲建立恋爱关系还有些顾虑，而与她则没有，于是我们俩开始好起来。剧社的同志也常常开我们玩笑，驻地部队的首长耿飚、王维周看到这个情况，也说，你们就在这儿结婚吧。我把我与丁玲的关系也告诉了席萍，如实讲了我对丁玲的同情，觉得她岁数不小了，又是那么一个好人。1940年秋，剧团在陇东庆阳，我和席萍结了婚。

我提出离婚时，席萍正住在中央医院，准备生孩子

1938年，丁玲委托她的亲戚，把自己的两个孩子祖林、祖慧从湖南

接到了延安。我到烽火剧社后，丁玲和我谈起，准备把祖慧送到托儿所，祖林比较内向、不活泼，问我是否能把祖林带到剧社去，那里环境比较活跃，我同意了。我是大队长，有自己的宿舍，晚上祖林可以跟着我睡。我觉得带一个十来岁的孩子不容易，怕他尿炕，夜里得喊他起来小便，他睡得正熟，有时虽然站起来了，却好像还在梦中。我那时才20岁出头，尽管喜欢孩子，可我没有带孩子的经验，有时也顾不了他，没办法，只好把他放到一个班里，那个班的好几个小学员后来成为名演员。祖林在我那儿呆了一段时间，后来丁玲把他送到保育院学校去了。

我与丁玲在结婚前就有过这样一种特殊关系，我带祖林似乎是我们的家庭关系的预演。祖林现在是离休干部，他参加革命的年龄，就是从烽火剧社那一段生活算起。他后来去苏联留学，学潜水艇制造，回国后因为受到丁玲被打成右派的影响，不能搞潜水艇，改搞民用船舶。1979年丁玲和我回到北京，祖林也调到北京的中国船舶总公司。

我和席萍结婚时没有告诉丁玲，对她的打击很大。当时就有好朋友对我说，丁玲听说我结婚了很痛苦。

在烽火剧社呆了一年以后，我就吵着要走，要求回马列学院。部队领导不同意。后来洛甫同志要我去文协的文化俱乐部。文化俱乐部是胡考、方纪在那里筹办，没有职务名义。洛甫、萧三对我说，你去当副主任。这时席萍已经怀孕。这段时间我听到的议论都说丁玲非常痛苦，我感到这种局面非解决不可。我想：席萍还年轻，各方面条件都好，还能找到自己的幸福，我得忍痛做出决断，不能让3个人都痛苦的局面再持续下去。于是我用鸡蛋里面挑骨刺的手法，制造一个借口，说席萍有依赖性，过于依赖丈夫，而我则喜欢有独立性的女性，我提出我们的感情不和，要求离婚。我提出离婚时，席萍正住在中央医院，准备生孩子，医院院长是我在马列学院时的一个同学，我告

诉她说我要和席萍离婚，请她协助做席萍的思想工作。席萍当然不同意，但是我的态度很坚决。那时也太年轻，不应该在她生孩子时提出离婚的要求。孩子出生后，我们分手了，分手时我说，孩子给我吧，你带着孩子再成家可能不方便。席萍不愿意，她舍不得孩子。她带着孩子留在中央医院工作，做化验员。1945年我离开延安准备去东北时，去看了她和孩子。那时她已经结婚了，爱人也在中央医院，搞化验，也姓陈。我再一次提出孩子让我带走，她还是不同意。我与丁玲结婚后，内心常责备自己为与席萍分开所找的那样一个借口，当时我的确没有办法解除3个人的痛苦，而与丁玲结合，只是把痛苦都给了席萍，这对她是不公平的。对席萍，我始终怀有负疚的心情。

我和丁玲是1942年在蓝家坪文抗结婚的

我和丁玲是1942年在蓝家坪文抗结婚的，婚后我们去看望罗烽的母亲罗老太太。当时我们一排4个窑洞，分别住着高长虹、罗烽的母亲、张汀(后来曾担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)、丁玲。丁玲对罗老太太说，我们爱得很苦。我们结婚没有张扬，没有请客。一次在路上碰到陈云同志，丁玲告诉他我们结婚了，陈云同志表示祝贺，说要把各个方面的关系处理好。

我与丁玲的结合，有些朋友对我们的关系能否长久表示担心。我知道，自己不应该也不可能再有变化，我不能错了一次还错第二次。丁玲是值得我去爱的，值得我用我的一生去爱的。我欣赏她的为人，她在西战团的工作，她一生的创作，我希望她能不断取得成功。她是个热情、正义、直率的好人，值得我终生帮助她。丁玲并不总是那种男性化风风火火的风格，她也有女性妩媚的一面。

(摘自《燕赵都市报》)

史海回眸